目　录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 ……董振修（1）

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

……徐彬如（30）

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断回忆 ……张友渔（39）

永不磨灭的忆念 ——记董季皋、安幸生二烈士

……董恂如（49）

参加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 ……司呈祥（69）

我所知道的党在天津的早期活动片断 ……张一清(108)

记一九二五年砸裕大事件的前前后后…… 项瑞芝(116)

一九二九年的狱中斗争 …… 左振玉(122)

北方书店的一段回忆 ……符　号(132)

白洋淀风云录…… 郑少臣(135)

补　白　郭宗鉴同志在狱中（29）
　　华新印刷厂（68）

图片十三幅 ……（插页）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10辑总目录……(15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

董　振　修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及革命社团的建立
△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
△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
△早期在天津工作过的一些革命同志的事略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包括“五四”时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天津的一些情况。本文依照时间顺序，分三个问题叙述：（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及革命社团的建立；（二）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三）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最后，整理了十位早期在天津工作过的革命同志的事略，作为附录。总的说，限于资料，本文记述的还仅仅是一些片断。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及革命社团的建立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天津和其他地方一样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热情地学习和宣传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表现为：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撰写马列文章，建立革命组织等几个方面。青年们很喜欢阅读反映新思潮的革命刊物，象北京的《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湖南的《湘江评论》，在天津吸引了许多读者。这些刊物，在大胡同中华书局和由王揆生、胡维宪协助办理的南开书报贩卖团都能买到。本地出版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新生命》等进步刊物，也发表了一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章，象《觉悟的宣言》、《社会主义与中国》、《中国的劳动家应该怎样去做》、《马克思劳动时间的主张》、《布尔什维司目和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等许多文章，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同志不仅写文章、翻译文章进行宣传，甚至在狱中五次向难友们系统地讲读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青年的杰出榜样。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曾来天津，参加社团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工作。如李大钊有一次曾与天津的姜般若，胡维宪、章志等到河东某苏联同志家里研究开展革命工作。邓中夏同志也曾运用长辛店的工作经验指导天津的工人组织与斗争。天津一些进步青年，成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经常往来京津，学习研究马列。

与此同时，天津先进青年建立了著名的革命组织“觉悟社”和“新生社”。“觉悟社”是以南开学校学生和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生为骨干的。这个社留下的资料较多，人们都很熟悉。“新生社”也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建立并开展活动的，它的第一个活动地点在现建设路芸芳里二号，第二个活动地点在现泰安里三号。该社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出版过

《新生》杂志，刊物的宗旨是：发表“新生社”的主张，介绍新思潮。这是一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这个社的成员以省一中学生为骨干，有于方舟（兰渚，省一中）、王天麟、韩麟符（致祥，省一中）、安幸生（毓文，省一中）、卢骕瑜、李小五、王隶华、王同华等十余人。后来，该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了会刊。稍后，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冬，又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于方舟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团小组，主要成员有安幸生、李培良、卢绍亭、郝久亭等人。同时在天津建立的另一个团小组，即张太雷（原名张太来，又名春木）小组，地点在今建国道九十一号。这个小组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如组织团员开会学习，彼此交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讨论革命理论问题；还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影响很大。团小组刚建立一个月，就在天津出版了第一份关于工人运动的报纸——《劳动》（日刊，又叫《来报》），后来，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查封，还没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他们又将报社迁出租界，改出《津报》，继续斗争。除出版报纸外，团小组还派人到唐山等地开展活动，领导工人斗争，把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天津最早建立的两个团小组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党的最早一批党员和优秀干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在天津的许多革命者加入了团组织、党组织，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开展工人、学生、妇女运动，为天津地委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一时期，党在天津的工作可以概括

如下：

（1）**宣传马列，推动工运。**党建立后很重视开展工人运动，办工人补习学校是一种重要的形式，这就把马列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时，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是其中的一个。天津是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是北方党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当时，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常来天津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指导安体诚（存斋）、于树德（永滋）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恒源纱厂附近的宇纬路东兴里建立了“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并不断给以关怀与指导。这所学校的章程、图书募捐启事和附设的“五五书报代卖社”启事在津沪报纸上公布。学校有教员若干人，安体诚、于树德亲自任教。安体诚、于树德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同时，党组织又派吴某来校任教，加强了党的领导。学生有四十余人，除补习文化知识外，着重进行阶级教育，提高觉悟。值得注意的是，与学校发生关系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所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称它是“天津工人运动的一道曙光”。这所工人学校，当时是党指挥天津工人运动的一个阵地。该校存在仅一年，就被查封了，有的教员被捕了，但毕竟为党培养了干部，推动了天津工运的蓬勃发展。

（2）**利用报刊，积极宣传。**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初，天津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氏学会诞生了，负责人是崔溥(物齐)。马氏学会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创办“唯一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新民意报》的副刊《明日》。《明日》的出版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底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先组织这个《明日》作为我们发表言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机关。”马氏学会还办了一个“马氏通信图书馆”，公布了借阅章程和书目，专门出借中、英、日文马克思著作，使更多的人从中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作马氏的信徒”，来“改造社会”。另一副刊《星火》也以相当多的注意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情况，曾转载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两篇讲演；还刊载和转载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苏联情况的许多文章。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了当时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同志撰写的约二十万字的五十四篇文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写的一些重要通信，其中有些文章热情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道路，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道理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表达了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这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天津人民汲取了宝贵的精神营养，大大鼓舞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

（3）**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这一时期，天津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北京地委的领导下，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之外，还从事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国团组织重新恢复以后，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天津、塘沽等十七个地方建立了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北方区委派党员来津，在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内建立了以于树德、李峙山（毅韬）为书记部正副主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成员共十一人，其中包括李腾（水产学校学生）、觉吾（久大工厂练习生）、李培良（甲种商业学生）、李季扬（南开学生）、吕一鸣（高等工业学生）、安体诚（法政学校

教员）等，从而加强了党对青年的工作，推动了工人、学生、妇女运动的开展。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天津设立支部，加强了党对天津工人运动的领导。天津支部曾致电国会参众两院，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以拯救我国劳动同胞。一九二三年初，在邓颖超同志等领导下创立了“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并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随后，该社出版了《女星》旬刊，还开办了女星补习学校。与此同时，天津成立了女权运动大同盟天津支部。通过这些妇女组织开展了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工作。

综上所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天津的迅速传播，逐渐武装了群众，涌现出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积极从事工人、学生、妇女运动，在天津历史上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一九二四年春建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二）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

天津的党团员数量日益增多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建立地方党组织，来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革命斗争。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样，国共统一战线就形成了，这对当时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着很大的

推动作用。共产党员于方舟同志以天津学联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二月，于方舟陪同共产党员江著源（江浩）和李锡九（字立三，又名永声）二同志回到天津。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党中央和北京地委蔡和森同志来津视察工作，传达在天津建立地委的指示，并责令于方舟在天津建党。是年春，于方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将天津党团分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为第一任书记（不久调北京地委，继由李培良同志负责，一九二五年李季达同志任书记，粟泽、彭真先后任组织委员，再后粟泽搞工运，彭真同志任过书记），组织江著源，宣传李锡九。决议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还具体部署了各项工作：李震瀛（宝森）、王仲义负责铁路工运；李志新负责印刷工运；宋树藩等负责学运、青运；卢绍亭、李培良负责纱厂工运；郝久亭、张兆丰负责农运；安幸生负责码头工运；王贞儒、邓颖超负责妇运；十月又调郝久亭、张兆丰负责军运。地委地下机关设在英租界张庄大桥义庆里四十号（原址现已改新门牌二十一号）。兼任国民党职务的地委成员于方舟、安幸生、卢绍亭等均住在机关，地委的一些会议就地召开，而有些会议为了安全则在江著源同志家中召开。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使天津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蓬蓬勃勃发展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于方舟立即在天津筹建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二机关均设在义庆里四十号。于方舟担任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江震寰担任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常委。地委同志全都担任国民

China

党省、市的各种委员，在团地委任职的共产党员，也多担任国民党省、市的领导工作。国民党省委委员均为党团员同志。天津的国民党可以说没有其他势力。①党组织就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一九二四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北京建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同志任书记。于是，天津地委就在北方区委和省委领导下，发挥国共统一战线的作用，利用国民党省、市机关的合法地位，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之前，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在高等工业学校举行，到会团员四十五人②，由韩麟符主持（韩在北方区委工作），选举产生了委员与候补委员各五人。委员为于方舟、李廉祺（即李希逸，后为叛徒）崔溥、王乃宽、张宝泉；候补委员是王贞儒（卓吾）、张儒林、卢绍亭、谢曦、邓颖超。天津团地委在四月十六日作了分工：于方舟为委员长，李廉祺为秘书，张宝泉为会计，崔溥为宣传，王乃宽为教育。团地委机关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联系方式，通过天津黄纬路高等工业学校卢绍亭转于方舟。团员每周开一次会，开会临时找地方，在崔溥家里、在省立一中、南开或达仁学校的教

---

① 当时，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称“国委”；另外，还有中共天津地委和农委机关，统称“三委”。

② 当时天津有党员七人，团员四十五人，为便于开展国共统一战线的工作，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天津建党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室都开过支部会。当时，团员多兼任国民党省、市委员工作，团的工作主要是在学生、教员中即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发展组织。团地委下设若干支部，大支部又设若干小组。团员队伍不断发展扩大，截止六月三十日，地委有团员六十五人；同时，有的团员入党。团委对团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活动都抓得很紧。

团天津地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协助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如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出版和推销革命刊物，组织报告讲演活动，纪念革命节日等等，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三）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

（1）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天津的情况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之后，冯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七日离沪北上时，发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段祺瑞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在北京被拥为“临时执政”。一个月之后，孙中山到京时，其对手已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的皖系段祺瑞了。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沪经日本到达天津，受到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动员和组织的天津五十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五万多人热烈欢迎。六日，孙中山原定在津演讲，不幸患病，邓颖超、马千里代表全市人民前往住地张园慰问。同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联合散发大量传单，号召人民团

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统一祖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解决国家大事。八日，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发表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仍然为人民的利益，进一步指出军阀必然遭到失败的原因。他再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十八日下午，天津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江著源，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史汉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崔物奇，反帝大同盟的安幸生，学术讲演会的邓颖超等五十余团体的代表。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者有二十个团体。二十二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邓颖超同志当选主席。在党的领导下，还组织了讲演队，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街头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共产党政治主张，造成日益高涨的革命声势，吓坏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抵抗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三十一日，孙中山带病赴京，于方舟、江著源同志等代表全市百万人民到车站欢送，并派周同宇（恩寿）等人护送到京。天津人民的热情迎送，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鼓励和有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车站时，受到了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同志亲自率领的工人、学生、市民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继北京之后，中共天津地委发起的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由于方舟担任主席。该会设文书、宣传、交际各科，党团员居重要地位，一切文件均由党团员起草。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开会致电孙中山。同时，地委派出党团员为骨干的宣传员队伍深

人郊区和铁路沿线进行宣传，做了大量工作。各界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次声势空前的以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人民革命运动。

为了反对三、四月间段祺瑞召开的分脏的“善后会议”，达到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全国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由赵世炎等同志直接领导，天津代表于方舟、邓颖超、江著源参加，江著源当选为常务委员，邓颖超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一致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外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一切军阀，解散其武装。

正在开会期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共产党为此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指出孙中山之死，自然是中华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不会随孙中山之死而停止的，要求全国民众继续为国民会议的促成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而努力。这之后，在天津地委领导下，天津各界群众团体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地委负责同志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会后，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表达天津人民坚决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同年，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被军阀李景林解散。

国民会议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政权，扩大了革命斗争的影响，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2）“五卅”前后，在地委领导下，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出现新高潮

中共天津地委在一九二四年春建立后，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运动方面。① 这年秋天，党组织派李培良到宝成、裕大纱厂，派卢绍亭到裕元、北洋纱厂，派周世昌到华新纱厂，派韩义到恒源纱厂。这些党员深入工厂，找工人谈话，启发群众觉悟，开办平民学校，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党员，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当时，在宝成纱厂建起了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国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会议特别指出，包括天津市在内的工人工作是全国职工运动的基础。会后，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加强天津的领导工作，派李季达同志担任了天津地委书记。当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团队伍不断壮大，不少团员入了党，党团组织在许多工厂发展了党团员，组织起红色工会，开展了斗争。同时，在农民、妇女、学生中的工作也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在先进青年中也加强了。当时，不仅有崔物奇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邓颖超领导的学术讲演会，都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为目的。五月一日，天津万人举行了庆祝大会并游行示威。五月四日，天津数万人开纪念会，于方舟讲了“五四”运动的伟

① 据周同宇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提供的材料说：

“那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工人方面。当时有群众宣讲所，我们常到宣讲所去宣传，主要内容是针对人民生活的问题，如宣传‘为什么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还宣传第一次直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利用群众的反战情绪，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样的宣传是符合群众要求的。”

China

大意义，号召青年们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这些活动，扩大了革命影响，唤起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天津地委立即派干部到各界加强了领导，发起和响应“五卅”运动，党领导的人民团体纷纷发出宣言与通电，对英、日帝国主义提出严正抗议。六月五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始罢课，走上街头，讲演宣传。十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出版《救国日报》。十四日，天津二百余团体十余万人集会，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邓颖超代表全市人民提出五项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英、日不平等条约；英、日政府必须惩办肇事驻沪领事；惩办凶首，担负抚恤金。大会选出邓颖超、安幸生、江著源同志等七人为请愿代表；会后，游行示威，并到省公署请愿。天津附近许多县还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全市人民积极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仅六月份内，就举行了三次有十几万人参加的大集会和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天津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时，党领导的天津海员工人的罢工影响很大。七月，在上海的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破坏“五卅”运动，派兵驱赶昌升、顺天等四艘轮船开往天津，以防止海员工人罢工的发生。这时，党中央电示北方区委，要求天津地委在轮船到津后，不再回沪，在津组织海员工人罢工。电报到达后，即由中共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等同志组成“天津海员罢工委员会”，领导海员工人罢工。七月二十一日，昌升轮到津，立即由当时在该船上工作的李维汉同志和天津地委的安幸生同志等组织起天津海员工会，发动组织了海员工人的罢

工，并发表了罢工宣言，表示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陆续到达天津的六艘轮船的海员工人和天津海员工人共同举行了罢工，日、英洋行码头的搬运工人也罢工响应。天津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海员工人罢工的后盾，并给以有力支援，使这一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不仅给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以打击，而且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在反帝斗争中，天津纺织、地毯、铁路、印刷、油漆、绱鞋等行业和一些工厂也相继成立了工会。在此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于八月六日，天津二十几个工会联合成立了天津总工会，安幸生为负责人。九日，全市工人群众游行示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同日，在党的领导下，由各爱国团体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发表了反帝宣言。就在这一天，宝成、裕大、北洋、裕元等纱厂两万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苛刻的惩罚制度；为此，包围工厂，与厂方警察和警备队展开搏斗。十日，工人、学生冒雨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通过日、英租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十一日，裕大纱厂又爆发了坚决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各厂大力援助，把天津的反帝运动推向高潮。起因是：七月二十四日，裕大纱厂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由李培良决定让贺志等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如下要求：①给工会房子；②八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③吃饭休息一小时；④增加工资；⑤打电报给上海英、日工厂要他们开工。前四条答应，后一条不答应，反而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镇压，工人被迫奋勇反击，于八月十一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援“五卅”运动，全厂两千多工人举行罢工。这一次，工人们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英勇搏斗，当场被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

工人闻讯，在工会领导下立即前往支援，各厂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缴了敌人一些枪支，捉住一些日本人和军警头目。接着，愤怒的工人群众一举将裕大纱厂日人公事房和机器砸毁，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这就是天津革命史上有名的“砸裕大”斗争。

就在砸裕大的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唆使李景林派出军警进行了早有准备的大逮捕，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总工会代表辛璞田、安幸生等十九人和几百名工人遭捕；同时，在日本人参与指挥下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打死工人二十余人，伤百余人。这之后，许多工人失业，缺少衣食，其中一百三十五人得到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天津市总会的救济。

此后，天津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一切群众团体均遭封闭，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群众革命团体及时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3）党组织利用国民军在津的有利时机，再次掀起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镇压了广东反动军阀的叛乱，酝酿北伐。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在南方的浙奉战争中，奉军失败了。十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奉倒段”运动。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统一政府”，这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当时，国民军由于军阀的矛盾和革命形势的影响以及党的具体发动工作，有了革命倾向，终于爆发了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

China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当国民军逼近天津的时候，党组织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派遣党员在天津秘密开展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还准备大小红旗三千余面，准备欢迎国民军入津。同时，在国民军一、二、三军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党派往国民二军四旅史可轩部工作的刘格平进入市内，协助地委组织工人武装力量，同时在津南组织了“华北农民自卫军”。党还通过国民党和群众团体作工作，如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如何欢迎国民军入津，届时要求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联派出代表联络各团体，筹备欢迎“五卅”时被捕的代表出狱！

十二月上旬以后，国民军与直奉军阀在天津周围进行大战，直奉军败溃，在北仓、杨村撤退时，党领导的工人武装，占领了李景林的督办公署，缴获了三、四千枝枪，切断其后路，迫使敌人抛弃大批弹药，狼狈退出天津。

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军进入天津，国民三军孙岳任督办兼省长，省会亦宣布由保定移设天津。党领导下的总工会、学联、妇联等几十个群众团体即转入公开活动，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散发传单，欢迎国民军，迎接在“五卅”运动期间被捕的同志出狱。当时，共产党的组织仍处在秘密状态，通过它领导的各群众团体及国民党进行革命活动。天津总商会、县教育会、青年会等九十一个团体的代表，在总商会开会欢迎国民军进入天津。国民军入津次日，遭李景林无理逮捕的各界代表辛璞田、安幸生等十九人获释，受到各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与慰问。天津市民一万余人为欢迎国民军和被释代表在南开操场集会，提出“国民军应与人民结合”的口号，并反对日本出兵。当时，天津充满了热气腾腾的一派革命气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